

求放心书

席云舒 著

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告子上》

求放心书

席云舒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求放心书/席云舒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5039-4034-7

I. 求… II. 席…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文集②文化思潮—中国—现代—文集 IV.

I206. 7-53 G1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1144 号

求放心书

著 者 席云舒

责任编辑 蔡宛若

装帧设计 孟 娜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 1 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7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034-7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自序

编选一本自己的文集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从1995年开始尝试文学评论和文化批评，到2001年因为工作变动而暂告一段落，期间发表过几十篇论文，绝大部分都是我大学时代的文字，那些文章显然很不成熟，大部分都拿不出手。当然我并不是说收在这里的这些篇目能够拿得出手，其实它们本应被束之高阁、付诸尘埃，但我听说从前晋有冯妇善搏虎，不幸我贾其余勇，恐不入虎口不知止也。

文学批评不同于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是建立在资料研究基础上的，因此形成的观点很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但批评往往是把握即时性的文学文化动态，面对的是新的作品和具体时期自己置身其中的文学文化思潮，虽然面对的是鲜活的对象，但往往时过境迁后再回过头看，就会发现自己当时认识的局限性。所以我在翻检以前发表的那些文章时，深为自己当时一些无知无畏的观点感到羞愧。

韦勒克把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其实不仅是文学，思想文化研究都可以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我收在这本小书里的文章谈不上什么研究，仅仅是针对一些作品和思潮作一些初步探

讨，如果探讨也可以分为内部探讨和外部探讨的话，那么除了几篇分析具体作品的小文章外，其他基本都是对文学和文化的外部探讨。文学和文化研究应当深入其内部进行研究，一切观点都从文本出发，通过文本形成观点，而不是让文本来适应观点。我过去的文章中，都或多或少地犯过这种削足适履的错误，而且我对文学和文化作外部探讨时，大概也是因为自己当时还很年轻，表达的欲望常常多于学理的沉思，以至于喜欢关注一些过于宏大的问题，浮躁之气常见于字里行间，而这正是学术研究的大害。

这本小书里的一些文章也基本能够体现我当初的一个思路，大致是一个理论创新的思路。那时候我与吴炫教授交往较多，也受到他一定程度的影响。我为什么把这些文章选进这本小书？虽然里面需要修订的观点有很多，但至今看来，我还是觉得当时的这个思路仍有一定意义。孟子说：“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今学问之心放之已久，我辈虽求之未得，但必欲求之，故为这本小书取名为“求放心书”。

诗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这本小书里学识观点上的瑕疵和谬误显而易见，学界师友，知我罪我，我知之矣。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转眼就要过去了，在这十年里，我只是文学和文化现场的观察者而非批评者，但我并未停止过对于我们文化出路的思考，在思想文化传播领域，我一直在努力做这方面的工作，未敢懈怠。也许在不久以后，我会重回批评领域，与学界师友一道，为我们的文化价值建设多作一些有意义的探讨。

这些年我虽住在北京，心中却时时想念远在扬州的恩师叶橹先生。先生已年过七旬，憾不能执弟子礼于左右，唯愿先生幸福康健。谨以此小书献给先生！

目 录

我们需要新的“子学”	1
个人话语与元叙事	6
文化全球化：现代化的误区	11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吴炫和他的“否定学”理论	16
从物本主义、神本主义到人本主义	
——“中国精神现象学”的视角与当代社会转型	31
平民主义的批评立场	46
论“朦胧诗”	55
“代”之外的独白	
——论“新生代”之后的中国新诗	79
自恋与逍遥	
——20 世纪 90 年代诗坛的山林意识辨析	92
自圣与自虐	
——关于 20 世纪 90 年代诗坛的教堂意识与虚无意识的批评	103

现代诗：时代的选择	
——与吕进、毛翰两位先生商榷	115
困顿中的反思	
——关于世纪之交的诗坛现状及其局限	123
个人化小说与个人叙事	133
反思“70年代后”及对它的一个个案解读	
——兼评林苑中小说《作为打火机的枪》	143
秩序的栅栏	
——评铁凝短篇小说《安德烈的晚上》	151
机智的文本	
——评申维中篇小说《东方红小学》	156
网络的崛起与文学的溃散	162
文学研究该如何面对网络时代的来临	
——关于资料与方法的迷思	167
价值凋零时代的文化重生	177
文明以止：人文的起点	190
后 记	225

我们需要新的“子学”^①

文化的进步从来便以理论的完善作为其自身的标志。当我们的文化理论从先秦百家时代“子学”^②的理论创造到其后漫长时期的注经式理论诠释，再到20世纪移植西方文化的理论复制，这个过程虽然使某种既成的文化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完善，但同时也使我们的文化历史基本呈现出一种原创动力日益衰落趋势。而如今当我们站在阐释理论和移植理论已在“批判与继承”中显示出双重阈限的话语现场，我们将不得不重新面对一些被遮蔽已久的理论命题：文化的进步是否必须以创造力的衰亡作为代价？如果文化的创造并不意味着一种进步，那么创造本身是否仍然有其必要？一俟文化创造已失去其必要的内涵，文化的繁荣是否又会令人感到可

① 本文原载《东方文化周刊》1997年第18期，原为提交1997年5月在南京大学举办的“第三种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

②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把中国哲学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疑？如果繁荣不能满足以一种文化的完善为其唯一标识，那么创造动力的式微又是否能够表明其进步所在？我们有理由认同一种文化价值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对维系一定的文化秩序所产生的作用，我们也有理由指责这种文化价值在历史演进中所带来的桎梏，问题在于我们的理论是否只要满足于修修补补的工作就真能使人安身立命。如果有一种文化只要在原始创造的基础上经过良种选择、优势嫁接就能一劳永逸地成为人们的精神皈依，那么为什么理想的乌托邦却又总被历史的机缘一再错过？如果当代理论确实已在“批判与继承”中获得了完善，那么为什么这种完善却又在纷扰不去的“文化消亡论”的喟叹中危机频出？

“文化进步论”企图在一块基石上永无止境地建造一座摩天大厦，殊不知这种富于热情的想象和“文化消亡论”一样令人难以乐观，因为它们都在以价值的匮乏作为其自身的代价。当我们今天讨论“后殖民文化”这一耐人寻味的问题时，我们应当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不应忽略的事实，虽然“后殖民”现象并不足以明证我们的传统文化已走向没落，但至少暗示了我们的既有文化价值已经出现的某种危机，苟非如此，“文化殖民”则纯属虚妄之谈。然而由“后殖民”话语所带来今天的传统文化原教旨主义情绪的高涨，却在一方面默认“文化殖民”的事实，另一方面又竭力为传统文化辩护，其间的悖论正在于，自身似乎已濒于没落的西方文化却在篡改着我们的文化传统，这是否明示着我们的既有文化在进步和完善背后潜藏的价值匮乏，而是否只要我们出于民族感情赞同传统文化原教旨主义的辩护，就能抹去其价值匮乏的危机？我们承认西方文化到后现代主义阶段已陷入消解意义的拼盘游戏，而其后的新历史主义企图通过“流通”和“谈判”来建立的文化新秩序却依旧姗姗来迟，女性主义文化亦在“女权”呼声中显得隐晦不明，这

一切均可以成为人们对西方文化已缺乏自足性指责的理由。但是否只要对中西方均已出现价值匮乏的两种文化进行批判继承与理论互补就能使其得以真正完善，却仍旧令人怀疑。因为多年的研究已显示出人类文化优势选择的张力和限度的不足，不仅这两种文化本身就存在着先天的抵牾，人类文化也不是先天充分自足的，如果脱离了文化创造，即便是优势选择也终将出现价值的匮乏，况且这种匮乏在 20 世纪关于“体用关系”的选择和今天的文化转型中均早已绽露出端倪。

“第三种批评”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而提出的创造理论，因此它不仅是对先秦百家时代“子学”的承接，也是对当代文化新的可能性的开拓，这种开拓在使文化的价值得以丰富和匡正的同时，也唤起了文化理论创造动力的复归。文化的繁荣不在于阐释和移植，而在于文化的创造，阐释和移植只能带来一种表象的虚假繁荣，当某种固有的文化价值被历史尘封之后，便不能再为人们提供精神皈依的场所，而创造性价值则必然成为时代的需要。长久以来文化理论创造动力的衰落只是缘于人们不愿承认这样的一种基本事实：人在世界中的存在本来并无先验的意义，一切意义的产生均源于某种创造性的设计。伏尔泰说“没有上帝也要给自己制造一个上帝”，正意味着对意义设计的必要所在，爱德华·萨义德所谓的“人的身份不仅不是与生俱来的、固定不变的，而且是人为建构的，有时甚至就是制造出来的”，揭示了对存在意义的创造性设计的必要。而创造性文化理论正是对一切意义的原始设计和创造，有了它，一切意义才成其为意义、一切价值才成其为价值，中国先秦百家时代的“子学”如此，西方古希腊理论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理论亦然。也正因如此，才有了中西方各种文化价值的纷呈。

长期以来中国文化之所以沉湎于对“六经”的注解诠释，这与古代西方神学具有同样的文化心理，不仅是因其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确立，而且还出于人们对因袭而来的普适性存在意义的依赖。文化信仰较之文化创造总是更为深得人心，这不仅由于它在一定意义上能够使人的精神有所寄托，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宁可相信现实的普遍主义的存在意义，也不愿返回无意义中去重新寻求存在意义，因为后者缺乏现实的功利意义。况且在今天重新设计存在意义的艰巨性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它非但需要完成对一切文化的价值重估，更要完成为时代所需的合理性文化建构，吴炫先生在《否定本体论》中以“否定冲动与否定能力”来描述这一过程，不失为智者所见。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在论述“非本真存在”时的清醒雄辩，而在面对“本真存在”时却凌空蹈虚，对此我们承认他完成了一次文化价值重估，但他在新的文化建构上所作出的努力仍然令我们感到困惑：对柏拉图式对象化本体（理念）的扬弃和对存在者存在的阐扬是否又会导致人的自我崇拜，难道法西斯主义不正是某种极端自我崇拜的结果？但我们不应因文化创造任务之艰巨便畏难止步，否则恐怕只能带来更深的价值危机，使我们的文化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桎梏中愈陷愈深。

对中西方既有文化理论的价值重估和超越是“第三种批评”的初衷，而对当代文化理论进行合理的创造性重建则是“第三种批评”的现实意义之所在，因此“第三种批评”不把某种既有的文化价值奉为主臬，也使理论摆脱了阐释和移植以及批判继承的修修补补的窠臼，存在意义亦借此由文化认同再度置换为创造设计。“第三种批评”基于吴炫先生的“否定”学说的确立而得以提出，“否定”学说以其对已在历史演进中显得捉襟见肘的现存东西方两种普遍主义文化的价值重估，进一步进入对无意义本身的否定而使

新的存在意义和文化价值得以凸现，把“否定”作为本体概念则意味着由此而确立的新的存在意义和文化价值在成为“共在”后便将面临新的价值重估，因而存在意义便本己地体现在“否定”之中。因此“否定”学说本身便是一种创造理论，它与“第三种批评”有着内在的渊源，但我仍想说明的是，不能把“第三种批评”完全与吴炫先生的“否定”学说混为一谈，“第三种批评”更意味着探求我们时代的“子学”，它同样要求出现新的“百家”，而这些新的“百家”则必须以创造理论为依据，它是文化的生命和活力之所托，也是诞生多元文化价值的根本前提。世纪之交的文化转型已使新的“子学”成为我们的需要，“第三种批评”已经作出了理想的开端，尽管这项工程还很艰巨，但却很必要。

个人话语与元叙事^①

今天，似乎只要一提起元叙事马上就会引起人们的反感。究其原因，如果尚不是出于对元叙事将是否可能重新导致一体化文化整合的担忧，至少在人们的意识中，元叙事早已与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产生了内在的关联，并因此而受到足够的警惕。因为元叙事本身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话语，它以从本体论到价值论上的一元性而赋予人们言说的力量，作为话语权的象征，它在文化中的存在方式便决定着整个文化的结构。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权力话语显然便是一种尤其突出的元叙事，它总是在名义上垄断着一切社会意识中最为权威的合法性，并往往以此来约束文化。而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则被视为中国当代的文化转型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权力话语消解的结果，且不论这种消解的力量究竟来自市场经济还是知识分子人文文化本身，总之它使个人话语始终对元叙事满怀敌意，好像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生来就与拼盘叙事一脉相承。近年来，无论是在文化批

① 本文原载《当代文坛报》1997年第4期。

评还是在文学本文中，这种意识都显得十分明了。

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因知识分子人文文化的边缘化而得以凸现。这亦即是说，中国当代的文化转型使知识分子从社会价值的中心走向了边缘，知识分子在疏离意识形态话语中心并不必再为之“代言”之后，他们的价值承当便可能由首先承当意识形态而承当社会，转化为首先承当自身而承当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置于社会和文化之上的元叙事，一种曾被译为“意底牢结”的权力话语，它通常因其要求文化的整一性并为之服务而取消多元文化的合法性，在这种文化秩序之下，知识分子便只能由首先承当意识形态而承当社会，他们的个人话语并不具备现实的合法性。但文化的秩序并不止于这一种可能，它的丰富性正体现在多元的结构之中，而多元文化却并不排斥个人话语，恰恰相反，个人话语正是文化多元化的重要前提和有力保障。一个开放的社会必须要求文化的多元，而文化的多元则使个人话语成为根本的需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当代的文化转型使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桎梏，他们获得的却是独立言说的权利。个人话语的形成在实质上便是知识分子对过去那种为意识形态“代言”身份的挣脱，他们对个人话语的维护也便是对自身独立言说的话语权利的维护。

个人话语在整个文化结构中只能体现为多元拼盘叙事，它因其对意识形态一元话语的突破而杂陈于当代文化秩序之中。但个人话语在维护自身的权利时必须分清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疏离意识形态的元叙事并不等于放弃个体的元叙事，文化结构的拼盘化亦不等于个人叙事的拼盘化。意识形态的元叙事对知识分子而言只是一种“他者”话语，因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凭借文化为自身和社会“立言”，而不是为某话语中心“代言”，知识分子所注重的应当是如何在文化上匡正一个社会的道德、信仰以及价值维系等安顿人们

的精神的问题，它首先指涉知识分子自身能否借此得以安身立命。如果知识分子尚不能承当自身，那么他承当社会便属妄谈；如果他仅能承当自身而不能承当社会，他则有负于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而意识形态因其要求文化的整一性，与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相悖，它不能作为知识分子承当自身而承当社会的依据，从历史上看，意识形态的元叙事从来便以名义上的合法性而制约着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它之所以仅具有名义上的合法性，在于意识形态的包罗万象性在对待具体情境时容易显得大而无当和捉襟见肘，它的匮乏只能依靠知识分子的独立言说来加以匡正，因而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则须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它虽然多年来一直不具有合法的名义，但却同样是社会存在的需要，一旦意识形态裹挟知识分子只能为之“代言”，或知识分子主动依附于意识形态而放弃个人话语，则必然使二者的合法性均为之大打折扣。

中国当代文化转型中的知识分子个人话语因市场经济所导致的人文文化边缘化和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话语而得以形成，无疑，边缘化在这里是一个契机，它使知识分子能够真正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并作为个人为自身和社会“立言”，然而，我们看到，在这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却显得那么茫然，自言自语而又不知所措，有人将其称为“批评的失语”，大概并非过分之言，其原因如果不是习惯于“代言”的知识分子尚未能够独立地言说，便是由于他们在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话语时也放弃了个人的元叙事，但无论是出于哪一种原因，它都将可能不仅意味着知识分子对自身话语权利的放弃，也是对自身责任的放弃。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历史中，知识分子所缺少的便是自我和自己的话语，当代文化转型给知识分子提出的要求便是建构自己的个人话语，而不是去依附“他者”话语，这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使然。知识分子建构自己的个

人话语，则需作出从本体论到价值论上的文化建构的努力，并以此为社会提供道德、信仰、价值维系等方面的合理范式，当然，以此来要求每个知识分子确实有些苛刻，但放弃自己便只能得到废墟。如果知识分子最终仍旧不能独立地言说，那么他可能面临的处境如果不是说不出话来，便是重新为意识形态话语所收纳并为之布道。

知识分子建构自己的个人话语仍旧必须依靠元叙事，因为元叙事不仅是一种话语权利的象征，它更是理论上的逻辑保障，我们所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等，无不牵涉着元叙事，元叙事并不只在意识形态那里存在，它在每个个人那里同样必须存在，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话语仅仅意味着疏离意识形态的元叙事，绝不是消解元叙事本身，否则必然使立场不成其为立场、观点不成其为观点，“个人”只能成为文化碎片的拼盘而无法独立地言说，更无法借此而承当自身及社会。元叙事赋予知识分子以言说的权利，知识分子维护其话语权利则必须维护元叙事，后现代主义的拆除深度模式、不确定内在性只能作为知识分子赢得自身话语权利的策略而不能作为目的，反之则会导致个人话语本身的不确定，这无异于黑格尔所谓的“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泼掉”。元叙事在文化结构中存在方式的不同决定着文化秩序的不同，强加于文化之上的元叙事只能导致一元性的文化整合，并限制着文化本身的社会功能；置身于文化结构之中的元叙事是多元化的基础，它虽使文化结构呈现出多元格局，但文化却不会因此而失去深度，反而只会因其丰富性而使社会得以优化，它虽杂陈于整个文化结构之中但并不缺乏内在的秩序，更不可能导致文化内涵的一体化整合；而完全取消元叙事，则必将使多元不成其为多元，文化最终只能成为一座废墟。

因此，坚持个人话语的元叙事将是中国当代文化转型的最终选择，它带给社会和文化的将是健康而丰富的多元叙事，文化的拼盘

将是多元的拼盘，而不是碎片的拼盘，我们的当代文化转型绝不是要把中国文化转变成后现代模式，而是要求知识分子真正建立自己的个人话语，它要求知识分子一以贯之地投入文化价值的创造，并以寻求自身和社会的精神安顿的途径作为其终极关怀的话语指归。在近年来的文化讨论中，我们看到有些知识分子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立场，其原因正在于他们对元叙事意义的疏忽，尽管我们承认知识分子的立场必须以时代性和现实性为前提，但它并不意味着朝秦暮楚。我们今天对元叙事的警惕，仅仅是对那些可能强加于文化之上并迫使人们遵从的权力话语的警惕，而不是对时代赋予知识分子自身的话语权利的拒绝，因此，我们必须区别地对待元叙事，它不仅不应为个人话语所排斥，相反，它正是个人话语得以实现的依据所在。